

Chine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

肖滨 主编

中国政治学 年度评论(2016)

Chine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

肖滨 主编

中国政治学 年度评论(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2016/肖滨主编.—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 - 7 - 100 - 12931 - 2

I . ①中… II . ①肖… III . ①政治学—评论—中国—
2016 IV . ①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281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2016)

肖 滨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2931 - 2

2017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9.5

定价:38.00 元

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

主编 肖 滨

执行主编 丁 辉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 | | |
|---------------|--------------|
| 白 夏（法国全国科研中心） | 陈 峰（香港浸会大学） |
| 郭巍青（中山大学） | 景跃进（清华大学） |
| 李连江（香港中文大学） | 林尚立（复旦大学） |
| 吕晓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 马 骏（中山大学） |
|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 | 史卫民（中国社会科学院） |
|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 | 肖 滨（中山大学） |
| 徐 勇（华中师范大学） | 王浦劬（北京大学） |
| 杨大力（美国芝加哥大学） | 张 鸣（中国人民大学） |
| 张凤阳（南京大学） |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 |
| 朱光磊（南开大学） | 周光辉（吉林大学） |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 | | |
|-------------|--------------|
| 丁 辉（中山大学） | 樊 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
| 郭忠华（中山大学） | 何建宇（清华大学） |
| 何俊志（复旦大学） | 黄冬娅（中山大学） |
| 李 泉（中山大学） | 李永刚（南京大学） |
| 刘 鹏（中国人民大学） | 谭安奎（中山大学） |
| 王 清（中山大学） | 叶娟丽（武汉大学） |
| 尹 钛（中国政法大学） | 张 健（北京大学） |
| 张紧跟（中山大学） | 朱 琳（中山大学） |
| 朱亚鹏（中山大学） | |

本书系郭忠华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出版缘起

溯归古典西学系谱，政治学曾显列最高之学术。因时代变易、观念转捩、学科分立，此至尊之荣虽成追忆，然西方政治学历经典范转移、方法更新，频发生机。回观中国，自近代以降，千年变局引发传统知识之危机，引西学以开生面遂成自觉，歧见多在体用之间。因应于理念更新、制度再造，政治之学虽时乖运舛，亦入西学东渐洪流。此间代代学人，勤勉不辍，于西方政治学之经典与前沿，遂译以为引介、阐释兼以传播，衡以规模，已蔚然可观。

物换星移，吾辈又逢社会转型之时势，再生政治文明之祈愿。中国社会政治之鲜活实践，多有解释之需与应对之切，政治学之使命自不待言。然西方政治学理论千枝百叶，国人各凭识见，采菁撷华，欲引为当下圭臬，惜乎每有足履不适之惑。殷鉴于此，时见有识之士自辟蹊径，或复归于传统价值，或立足于时下经验，欲为吾国政治自成一说。此般心志，足堪称誉，然绳之以学理，则多疏于周延，共识尤为渺然，吾人可谓其修也远。

如是观之，吾国政治学囿于西学研究之译、引、释、传，已遇瓶颈之困；而反求诸己，标立学术自主，又似力有未逮。吾等当务之急，盖立于本土关怀，厘定问题意识，力克西学引介之疏浅，检省国人探索之得失。一言以蔽之，研究既有之研究、剖析过往之论述也。唯先立于现实困惑，因而追究学理，理清其脉络，评断其论争，审视其功过，方宜继之以学理重构。若循此道，则中国政治学之现实感与学理性可望相携增益。

社会政治变迁之驳杂实践，凸显既有学理资源之局限与理论反思之迫切。而吾辈政治学人，于“研究既有之研究”已有体认且着力担当者，亦不乏其人。势命之，人应之，功可期也！惜乎此番志业，尚无专门学术媒介，以为承载，兼与助推。有鉴于斯，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酝酿有时，立意创办《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寄望于此刊者，一为转换学术视野，对西方政治学理不唯引介，更予批判省察；二为促进知识创新，令既有研究于学理益加圆融，令新知构造获享言说平台；三为回应现实问题，以现实校验成理、滋育新见，以学理解析经验、议策纾难，促成理论探究与社会实践良性互动。

本刊自草创始，将连年甄选年度主题，邀学界同仁陈断学案，爬梳纹理，惠示洞见。《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内容，系于专门议题；文章理路，重

在争鸣脉络；文献跨度，视乎论题源流；作者评论，力显探究深度。受邀撰稿者，无分海内外，兼有前辈后学，端重其学有专攻，视野至于广大，而研习尽于精微。

依藉此刊，为佐助中国政治学研究略尽绵薄，是本所同侪不易之念；垂注评鉴，相与为谋，是所望于学界同仁与读者诸君也。

中山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谨识

目 录

引言：当代政党研究的比较政治学转向 丁 辉(1)

总 论

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理论成果、现实反思、发展愿景 张春满(7)

经典理论

政党转型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变革研究 周建勇(43)

西方党内民主理论研究述评 丁 辉(63)

研究方法

测量政党体系：量化理路与前沿 何俊志(92)

比较视角

威权主义韧性视角下的政党研究 张长东 刘 茹 樊旭阳(107)

非洲的一党制国家：一个文献综述 闫 健(123)

引言：当代政党研究的比较政治学转向

丁 辉

20世纪中叶，一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断言：“政党创造了民主，现代民主离开了政党无法想象。”(Schattschneider, 1942:1)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回头看，政党具有基于历史功业的正当性；二是向前看，政党具有塑造未来秩序的正当性。这两重观点不仅有修辞上的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也一直都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可以说造就了政党研究的“黄金时代”，各种重量级的专著与论文层出不穷，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世易时移，无论是“回头看”还是“向前看”，今天这两个基本判断都日益遭受质疑，最直接的后果是，当代政党研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

首先，现代民主的历史是怎样书写的呢？究竟是政党创造了民主，还是民主创造了政党？历史并没有选择单行线，事实上，有些政党是先于议会民主产生，譬如英国保守党，而有些政党则是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譬如英国工党(Duverger, 1954)。更准确地说，政党和民主制度交互作用，互相塑造，譬如说德国的绿党，把环境政治带入左右竞争的意识形态光谱，同时又在从街头走向体制的过程中，为议会民主所驯化。如果把仇视民主的政党考虑进来，情况就彻底不同，譬如纳粹党根本就是魏玛共和的掘墓人。无论如何，历史并没有赋予政党以创造民主的神圣力量。

其次，随着当代各国政党党员人数的不断下降，公民对政党认同的不断下降，在民主社会的许多公民眼中，政党已经变得可有可无，那么，为什么政党对于民主制度而言却还必须是不可或缺的呢(Lipset, 2001; Dalton & Wattenberg, 2000)？这种关于政党必要性的无条件预设，至少生成了三个方面的研究病灶。其一，把民主政治简化为政党政治，遮蔽对政党自身的民主性质的审视与反思。精英民主只需通过政党政治获得正当性，这个曾经很有说服力的逻辑，如今遭到了广泛质疑：内部不民主的政党，仅仅依赖彼此之间的程序性竞争，就可以实现国家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吗？公民即便是有了选举权，就有了选择权吗？在不民主的政党之间进行“民主”选举，或许不过是“选坏”，而绝非“择优”。其二，低估其他形式的公民政治参与政治动员的价值，以及这些非政党政治(non-partisan politics)

内容对政党政治的渗透和影响。其三,“现代民主”一词在西文语法上的单数形式,暗中已经预设了民主政治的一元普世特点,以西欧政党民主(party democracy)为复制底本,排除了非西方世界的非竞争性政党政治实践的比较价值。以上三种病灶都导致了当代的政党研究陷入了封闭的小圈子,往往自说自话,缺乏对新鲜议题和研究对象的关注和回应。

因此,当代政党研究急需实现两个转向。第一,从政党民主研究转向政党政治研究,把政党从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主角还原为一种不完善的、可取代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样一来,民主才能够再次获得价值力量,作为一种衡量标准,用来审视和检验政党的正当性品质,同时,让党内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研究议题能够真正进入主流政党研究学者的视野(Biezen & Saward, 2008)。第二,从西方政党研究转向比较政党研究,尤其是把非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非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放置在比较政治学的框架下去考察。由于政党和具体的政治语境的关系非常密切,深深植根于民族国家政治的特殊结构当中,所以,要创建一个无所不包的超越时间和地理限制的政党理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Beyme, 1982: 20)。即便是政党研究学术史上成果最多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以及相关的政党转型研究,基本上都是百家争鸣的状态,而没有毫无争议的理论成果。其中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类型学研究和转型研究要么是以西欧政党为主要经验支持,要么是从美国政党政治获得启示,一旦试图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其“概念旅行”(travelling of concept)的能力随即大打折扣(Sartori, 1970)。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精英政党到大众政党的发展还能算得上是学界共识,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著名的“全民党”(catch-all party)、“卡特尔政党”(cartel party)这两种政党类型从一提出就备受争议,至于新世纪以来政党类型变迁的最新走向,更无定论共识。

基于以上对当代政党研究转向的批判性认识,本期《中国政治学年度评论》选择了“比较政党研究:理论、趋势与方法”这一主题,特邀国内多位优秀的研究学者参与进来,确定选题分工,并于2016年5月在中山大学举办了同一主题的工作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交流。我们希望,通过组织本次专题综述,能够检讨当代政党研究的若干重要领域,鸟瞰过往理论成果,展示学术研究脉络,评断学术争论,瞻望未来研究日程,为推进我国的政党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本期年度评论主要分为四个专题版块。第一个版块是对比较政党研究的总体回顾与展望。张春满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极具信息量的综合评述,涵盖政党的概念、功能、类型以及政党—国家关系、政党—社会关系等五个方面,勾勒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的基本学术脉络,尤其是总结了在诸如政党类型、党员结构、政党衰败等具体研究问题上,当代世界顶尖政党研究学者的重要学术对话与反思。张春满进而指

出,迄今为止的政党研究传统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主要是根植于西欧政党实践,一方面不容否认,的确是做出了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却也限制了政党研究的视野。因此,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是当代政党研究延续生命力必须打通的重要关节。此外,张春满建议,未来的政党研究要在三个方面有所加强和突破。其一,理解和解释“缝隙政党”(niche party)的崛起,及其对主流政党所造成的冲击,并分析主流政党是如何适应和应对“缝隙政党”所提出的严峻挑战。其二,重视政党内部的派系政治对党内民主、政党竞争、政党分裂、选举政治等的影响。其三,创建、完善和利用政党数据库,把大数据技术应用到政党研究之中。

第二个版块是对经典西方政党理论的批评性回顾。强调比较政党研究,并不意味着放弃西方政党研究。相反,西方政党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学术史的关键遗产与知识积累,为开展比较政党研究提供了批判性建构的路径。周建勇和丁辉分别探讨了西方政党研究领域中的两个经典问题,即政党转型问题与党内民主问题。根据周建勇的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党研究中,从“政党僵化”理论向政党转型理论的焦点转移,根本变化是把政党看作有学习能力的制度行为者。周建勇指出,政党转型是政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演进性回应(evolutional response)。一方面,政党转型宏观上体现为模式的转型,政党研究的焦点议题就是政党的卡特尔化问题;另一方面,对政党转型具体内容的研究,侧重于政党转型的自主性、主动性以及转型战略等。周建勇分析指出,大多数政党研究学者都从政党自身的变化和政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来解释政党的变迁和转型的原因,认为任何变化都是内外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政党转型的发生依赖于组织内外的相互作用。在此综述的基础上,周建勇还就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性政党向执政党转型,以及新世纪以来以提高执政能力、治理能力为梯级的二次转型等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周建勇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适应性转型”模式,其根本特征体现为延续和变迁这两大主题:作为一个开放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学习和适应的能力;与此同时,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延续性。

党内民主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经典研究领域。丁辉指出,20世纪以来的西方党内民主研究主要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第一,党内民主是否以及如何必要;第二,党内民主是否以及如何可以实现。前者涉及规范概念,后者着重经验事实。对这两个问题是予以肯定还是予以否定,就导向批判党内民主和倡导党内民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传统。丁辉重点归纳了倡导党内民主的学者所采取的五种研究进路:规范参与进路、沟通

协商进路、法律实证主义进路、理性选择进路与系统分析进路。这五种进路都从不同程度回应了批判党内民主的研究者所提出的挑战,但也分别有着无法解决的理论缺陷。丁辉认为,两种理论传统及其所包含的研究进路,都有各自的理论优势与劣势,它们之间彼此交锋的关键所在,是党内民主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四组重要的张力关系: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定位;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的冲突与共存;党员参与与组织效率的消长关系;党内民主在规范和现实之间的发展两难。由于这些张力关系的必然存在,结果导致不同政党的党内民主化水平会出现分化。不是所有的政党都能够达到适应党内民主的最优化,也不是所有的政党都愿意实现这种适应的最优化。丁辉指出,如同现代国家民主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一样,民主化并不保障国家能力的提升,而党内民主也不是政党在面临组织衰退的大时代背景下进行自我拯救的灵丹妙药,然而,更精确地说,民主是个问题频发的“好东西”,党内民主同样如此。因此,针对未来的党内民主研究,丁辉建议,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平衡前述几对张力关系,以及哪些政党的民主实践提供了建立更好平衡机制的经验,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批判—护教”这一两军对垒的格局之中进行重复性研究。

第三个版块是政党研究方法。何俊志的问题意识集中在如何测量政党体系这一问题上。通过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政党体系测量方式有关文献进行跟踪,何俊志认为,将政党体系进行精确测量的学术进展,可以概括为三条研究对话的脉络。第一条脉络是从数量到指数,即放弃粗陋、笼统的计数方式来划分政党体系,转而发展出一系列公式化的测量指数,以求实现测量的精确性。但是,指数化测量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一是对象层次过于单一,往往局限于议会中的政党分布,二是没有考虑时间变化。第二条研究对话脉络的发展聚焦于解决时间维度的问题,从测量静态体系到转向测量动态变迁,分别建立在总体和个体两个层次上系统测量政党体系变迁的指标体系。何俊志认为,这一研究进阶的努力在理论上开辟了新的空间,不仅对各国政党体系的长时段变迁提供了更为精确和多元的描述模式,而且为政党体系变迁的社会结构决定论和选举制度决定论之间的竞争性解释提供了更为多元和严密的论据。第三条研究对话的脉络侧重于丰富测量对象的维度,从原先的一维测量发展到多维测量,涵盖了选区和议会这两个选举制度上的维度,也纳入了意识形态重心、意识形态分化等维度,有利于深入解释各种政党体系指标之间存在差异的根源,且可以从“国家—地区”“政党—政党”“国家—国家”等多个维度对政党体系进行描述和深入比较。何俊志指出,如何将政党体系的精确测量与政党联盟研究相结合,以更为准确地解释现实政治的运行,同样构成了政党体系测量相关成果推动理论更新的一个新兴领域。

第四个版块是非西方政党体制研究。政党研究需要比较的视野，正如张春满所指出的，比较的视野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张长东等、闫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把比较的目光放在了威权国家的政党制度上。张长东等的视角侧重政体的非民主性，闫健的视角则侧重政党体制的非竞争性。张长东等从政党组织、政府中的政党和选民中的政党这三个层面上来展开梳理，指出威权体制下一党制能够延续，主要是因为其专制统治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其一，精英之间实现了权力分享，而非产生分裂冲突，因为后者将导致威权主义崩溃乃至民主转型；其二，该政体对大众实现了成功控制。张长东等指出，威权主义韧性视角提供了新进路，新资料、新变量、新方法也被纳入进来，大大改变了对于威权主义体制下政党制度的研究。与此同时，威权主义政党研究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亟待学界推进，一是突破不足，针对早期的一些经典研究命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和发展，二是对威权政党的制度主义解释依旧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困扰。张长东等进一步指出，威权主义政党研究丰富了比较政党制度研究，在指出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下政党功能和运作模式的区别的同时，也指出了二者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其内部组织和政党联系民众的模式方面。另一方面，对成熟民主国家当年的庇护主义的盛行及其消逝的研究，也会对威权体制下政党和选举的研究有所启示。

非洲政党研究是比较政党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闫健提醒我们注意把握一党制对理解非洲政治的重要性。虽然随着大多数非洲一党制国家卷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学成为显学，而西方学术界对于非洲一党制国家的研究逐渐式微。但是，通过对非洲一党制国家出现的原因、功能、实际运作以及治理绩效等研究问题进行梳理，闫健认为，对于非洲政治研究者而言，非洲一党制国家所彰显出的非洲政治的深层次特征，依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探究价值。首先，一党制国家的兴起与衰落凸显了非洲大陆国家构建的结构性难题。其次，一党制国家也彰显了非洲政治的非正式性特征。非洲政治的非正式性与非洲大陆国家构建的困难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缺乏对社会的强大渗透能力的情况下，国家只能选择与既有的社会权威达成妥协。第三，非洲一党制国家也反映出非洲各国政治精英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党制留下的制度遗产，例如新家长主义体系与非正式规则的主导地位等，都依旧制约着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而如何超越一党制的制度遗产、应对非洲大陆国家构建的结构性难题并最终改善非洲国家的治理绩效，仍将是决定非洲国家民主前景的关键所在。

参 考 文 献

Beyme, K. von. 1982. *Pareien in Westlichen Demokratien*. München, Piper.

- Biezen, I. van & Michael, S. 2008. Democratic Theorists and Party Scholars: Why They Don'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Why They Shoul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6(1), 21-35.
- Dalton R. & Wattenberg, M.P. eds. 2000.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verger, M.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Press.
- Lipset, S.M. 2001.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1(1):48-55.
- Sartori, G. 1970.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4):1033-1053.
- Schattschneider, E.E.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Rinehart & Company.



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理论成果、 现实反思、发展愿景

张春满 *

现代政治及其政府过程往往离不开政党。例如,奥德丽·安德烈(Audrey Andre)、塞姆·德波(Sam Depauw)和斯蒂芬妮·贝恩斯(Stefanie Beyens)就认为代议制民主就是政党民主(Andre et al., 2015)。政党因素的重要性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不言而喻,在后发展国家、新兴经济体乃至欠发达国家也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很多研究关注了政党与民主化的关系(Haggard & Kaufman, 1995; Brownlee, 2007; Hanson, 2010)、政党与政体崩溃的关系(Brzezinski, 1989; Smith, 2005; Kalyvas, 1999; Magaloni & Kricheli, 2010)等。当然也有特例存在,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政党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谈不上对政治产生任何影响。比如有六个太平洋岛国就在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建立了民主政体。这种情况是比较极端的,因为一方面这些国家都比较小,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导致了政党无法出现(Veenendaal, 2016)。

政党进入现代政治的视野已经至少300余年,但是对政党及政党制度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却才仅仅几十年的光景。具体来讲,政党研究理论的出现还是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1963年的时候,大卫·阿普特(David Apter)专门撰文指出:“现在所缺乏的正是关于政党的理论。”(Apter, 1963)那么是不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真的没有关于政党的理论研究呢?是,也不是。其实,像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英国学者都对政党做过一些研究。例如,休谟从个人派系和组织派系两个维度出发对政党进行了一个类型学的分析(Hume, 1742)。而伯克曾经为政党下过一个定义:政党就是一群人团结在一起,根据他们彼此同意的特别原则,通过共同的努力而推进实现国家利益(Burke, 1770)。此后,陆续有一些学者(例如Anson Morse)对政党进行了一些理论发掘工作。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对政党的研究尽管在

* 张春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当时的条件下是前沿的,但现在看来是非常零散的、不成体系的,有些观点甚至是不准确的。

本文试图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政党研究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首先,文章试图对比较政党政治的知识谱系进行一个评述,从政党的概念、政党的功能、政党的组织(类型)、政党与国家和政党与社会五个方面展开。接下来的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反思环节。根植于西欧政党实践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提高了我们对政党政治的理解,另一方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者的研究。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反思西方中心论下的政党研究。文章的第三部分会对 21 世纪的政党政治研究方向进行一个简单的评析,提出一些比较重要和前沿的研究领域。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一、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的知识谱系

对一个领域进行知识谱系式的介绍有多种方法。有些作者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介绍,有些作者是按照问题领域逐步展开。在这部分,作者采取按照问题领域来搭建比较政党政治研究的知识谱系。具体来讲,这一部分会从政党的概念、政党的功能、政党的组织(类型)、政党与国家和政党与社会这五个方面展开。尽管这五个方面的讨论不能涵盖政党研究的方方面面,但是对比较政党政治形成一个大致的学科认知体系是基本足够的。

(一) 政党的概念

社会科学的研究从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的定义开始。政党的概念不胜枚举(Burke, 1770; Downs, 1957; Key, 1964; Chanbers, 1967; Epstein, 1980; Reagan, 1984; Schlesinger, 1991; Aldrich, 1995)。埃德蒙·伯克等英国学者在很早之前就对政党做过一些研究。例如,他曾经为政党下过一个定义:政党就是一群人团结在一起,根据他们彼此同意的特别原则,通过共同的努力而推进实现国家利益(Burke, 1770)。伯克的定义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比较模糊。美国学者安森·莫斯(Anson Morse)在伯克定义的基础之上也对政党进行过界定。他认为,政党是一个持久的组织。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讲,它是由一群被共同原则所团结起来的公民组成的。在更加复杂的意义上,它是由两个或者更多这种类似的被共同的政策结合在一起的团体组成的。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全体国民而是一个他们所代表的特殊群体或者多个群体的利益和观念的实现(Morse, 1896)。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政党的政治目标上莫斯的定义比伯克的定义要更加准确。政党所代表的不是全体国民的利益,他们只是代

表一部分群体,他们要实现的也只是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对政党的概念化研究做出奠基性贡献的另外一位美国学者是著名政治学家瓦尔迪摩·凯伊(V.O.Key),他把政党定义为“三位一体互动体制”(tripartite systems of interaction),包括“选民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三个视野(Key, 1942)。凯伊的三位一体概念对后来包括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在内的诸多政党政治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一位在政党概念研究方面声名鹊起的学者是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他的《政党和政党体制》这本经典著作中,萨托利没有给政党提供一个简洁的定义,但是他着重强调了政党的三个方面。第一,政党不是派系。政党虽然发源于派系,但是政党必须是超越派系的,那么萨托利此举是为了给政党正名,指出政党并不是像派系那么狭隘地、固执地关注自己的利益;第二,政党是整体的部分。这就是说,政党是代表整体的部分,它试图通过服务整体的一部分进而来服务整个总体;第三,政党是表达的渠道。政党在现代政治中有多重功能(例如代表功能和引导功能),但是萨托利最为看重的是政党作为表达渠道的功能(Sartori, 1976)。

在萨托利之后,学者对政党的概念渐渐趋于一致。卡茨认为政党的本质就在于,它有意愿去“执政并且为自己的执政负责”(Katz, 1987)。约瑟夫·拉帕洛巴拉(Joseph LaPalombara)和杰弗里·安德森(Jeffrey Anderson)认为不能以名字来判定一个组织是否为政党。一个组织符合政党的条件有三:政党的存在时间要比它的创造者的生命要长;在组织意义上,它必须在基层和国家两个层面都有活动;它必须通过在选举中竞争意图占据政府的主要部门,并且通过联合其他政党或者依靠自己行使权力(LaPalombara & Anderson, 2003)。一般来讲,大家都能接受这样一个定义,即政党是以执政,或促进和保障特定政治思想、政治利益为目标的团体。但是,在对一些具体的政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时,学术界时不时还会出现概念之争。比如,关于如何定义晚近西欧所出现的“缝隙政党”(niche party)、极右翼政党(extreme right-wing party),以及它们与主流政党的区别又在哪里,几无共识(Meguid, 2005, 2008; Basile, 2015; Ezrow et al., 2010)。此外,当政党日益变得卡特尔化(Katz & Mair, 1995)而成为国家本身的一部分时,主流政党定义是否依然成立?这些理论难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 政党的功能

政党的功能是讨论政党政治的重要方面。萨托利最为看重的政党功能是表达渠道的功能。在他的理论视阈中,政党是公民政治参与表达自